

蔣復璁與圖書館事業（六）

蔣復璁口述
林淑蘭筆記

蔣復璁先生想做件大事，希望世界矚目，便是重印四庫全書。歷經波折，這部全世界最大的書，始由商務全部影印出版，從發行至完成，歷時六十餘年。

中央圖書館成立之時，我想做件大事，希望世界矚目，便是重印四庫全書。那是民國二十二年的事。

全世界最大的一部書

因為四庫全書三萬六千多本書，這是全世界最大的一部書，從前由商務印書館提議將這本書重新翻印出版。這部書是在乾隆年間編好

的，三萬六千本，編好之後繕寫了七部，分置

七處：皇帝宮裡的文淵閣，圓明園的文源閣，熱河行宮的文津閣，盛京瀋陽的文溯閣。這四部稱為北四閣。為什麼都有水邊的，因為書最怕火，取水的部首，是為了希望水能克火。

另外三部擺在江南民間用的，一部放在杭州西湖的文瀾閣，一部擺在鎮江金山寺的文宗閣，還有一部放在揚州的文匯閣。合稱為南三閣。宮裡頭的大一點，這三部則小一些。這些書是在乾隆三十八年開始編纂，花十年的時間完成，一共有三千四百六十種的書，有七萬九千三百三十九卷，三萬六千多冊。

國後大家主張重新影印。

四庫全書影印滄桑

民國九年法國巴黎大學創設中國學院，想得到一部四庫全書，法國總理班樂衛應邀到中國訪問，也向北洋政府建議印行四庫全書，並將送一個文學博士給當時的總統徐世昌，希望能得到四庫全書。北洋政府雖預備影印文津閣本，但因缺乏經費，而沒有成功。

民國十三年，商務印書館為慶祝開館卅週年，想影印四庫全書作為紀念，該館想印的是文淵閣本，這是最早寫成功的一部，是錯字最少的、最好的一部。商務印書館計畫根據文淵閣的縮印，分為三種裝式，印四百部，已獲得政府的同意準備將庫書運到上海影印，書都已經裝箱運上車子，突然當時總統曹錕手下的總務專權人士李彥青，以為印這本書有利可圖，於是打算要敲六萬塊錢的竹槓。他要商務印書館拿出六萬塊錢來才將此書放出京，商務印書館不肯付這種錢，李彥青便不准將庫書裝運出

京。其實商務印書館並不是拿不出這六萬塊錢，只是不願做行賄的事情，因為文化事業是很公開的事。於是重印四庫全書又告失敗。

到了民國十四年，段祺瑞主政，葉公綽任交通總長，章士釗任教育總長，兩人主張印四庫全書，將存放在京師圖書館的文津閣本，委託商務印書館來印。當文津閣本已全裝箱出京時，又發生了變化，遭到了許多人的阻撓。這時江浙有戰事，交通受阻，又受到反對，於是這第三次提議重印四庫全書又成了泡影。

民國十七年秋天，東三省長官張學良、楊宇霆想用東北瀋陽的文溯閣本，重印文溯四庫。後來張、楊兩人爭權，楊宇霆被張學良槍斃了，所訂的重印計畫尚未做好，主持重印者無人，所以第四次影印的計畫便停頓了。

在此期間有人主張不必將四庫全書全部影印，不妨選印精華就好，那是民國十四年的事。所以十九年當東北文溯閣沒印成功之時，有人主張挑一部份來印，將裡頭的孤本三百多種，預備用文溯閣的本子在東北印，但又沒有成功。十四、十九年的兩次失敗，使重印四庫不得成功達於六次之多。

完成圖書館事業一件大事

我在民國廿二年奉命籌備中央圖書館，我建議政府用這個計畫，將四庫裡頭重要的孤本先印，這是第七次重印，選一部份重要的先印，叫做「四庫珍本初集」，經選印其中罕傳的

書有二百冊一種，一千九百六十冊。我這次印成功了，是用故宮博物院所藏的文淵閣本。

當時華北的局勢動盪不安，中央政府為維護文物安全將故宮博物院南遷，先是遷到上海

，那部文淵閣本也在裡面，所以我就利用這部書由北京到上海的便利，政府派我和商務印書館訂約，這次成功了。我印一千部，商務印書館給我一百部算是版稅，我將這一百部書向國外交換書籍。今天，中央圖書館的書架上還有一部份外國書籍，是我當時以「四庫珍本初集」向外國換來的。

那時我辦圖書館的經費一個月四千元，經費太少了。於是我想了兩個辦法：一個是「新版圖書呈繳規程」，所有中國新出版的書統統先送到中央圖書館，中國的書便不花錢。外國書如何取回呢？另一個辦法便是用「四庫珍本初集」和外國交換書。這是我替中央圖書館做的二件事。尤其影印四庫全書六次別人辦不成功，第七次我辦成功了，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

後來我擔任故宮博物院院長，王雲五先生是故宮博物院管理委員會的主任委員，我們二個人當初合作了「四庫珍本初集」，到台灣來繼續合作，再印了十二集。因為珍本初集已出版了三十年，存留的不多，於是重印了初集，再繼續印了十二集，加上別集一部。這是民國五十七年的事。總共十三集，共得書一千八百七十二種，一萬五千八百冊，以總數來說，才印了二分之一；但以冊數而言，則不到一半。

當時中央研究院的總幹事丁文江先生，因南京北極閣新廈落成，主張將南京、上海兩地辦事處人員集中辦公，他認為出版品國際交換處，應是由中央圖書館來辦，比中央研究院適合。丁文江先生是我百里叔叔的好友，與我有世交的關係，但我們純針對公事來辦，他準備將中央研究院在上海設立的出版品國際交換處移交给中央圖書館辦理。我則說沒錢，因為與國際交換出版品，一年的郵費不少。丁文江先生就對我說，今年頭一年每個月由中央研究院貼補三百

庫全書一次印完，全書一萬一千五百冊，於十五年全部竣事。從民國廿二年我印「四庫珍本初集」，到民國七十五年，歷經六十餘年，才大功告成。

商務印書館印三千部，送故宮博物院三十部，故宮用以送人和交換。四庫全書在我有生之年影印完成，是我一生從事圖書事業的大事，也是中國圖書出版事業的一件大事。

三個辦法充實圖書收藏

中央圖書館因此奠立下了基礎。中央研究院在上海有一個出版品圖書交換處，那是中

研院和國外辦理圖書交換的。本來在比利時有一個國際交換協定，各國自己政府出版的書互相交換，所有參加此協定的國家互相交換出版品，不必付錢。中央研究院履行此國際協定，所以在上海成立了一個出版品國際交換處。那時（民國廿四年）中央研究院有兩部分，一個是在上海，一個是在南京。

當時中央研究院的總幹事丁文江先生，因南京北極閣新廈落成，主張將南京、上海兩地辦事處人員集中辦公，他認為出版品國際交換處，應是由中央圖書館來辦，比中央研究院適合。丁文江先生是我百里叔叔的好友，與我有世交的關係，但我們純針對公事來辦，他準備將中央研究院在上海設立的出版品國際交換處移交给中央圖書館辦理。我則說沒錢，因為與國際交換出版品，一年的郵費不少。丁文江先生就對我說，今年頭一年每個月由中央研究院貼補三百

塊錢，明年則由中央圖書館編列預算。

於是，我將此交換處在中央圖書館未正式成立之前，稱為「教育部出版品國際交換處」，代表國家履行國際交換協定。到今天的中央圖書館仍有出版品國際交換處，在做著代表政府，與各國辦理交換出版品的業務。

民國廿四年中央圖書館經費拮据，我以三個辦法來充實圖書館的收藏，一是根據「新版圖書呈繳規程」，所有的中國書完全不花錢。二是以與商務合作出版的「四庫全書珍本初集」，與外國交換外文書籍。三是利用「出版品國際交換處」，代表國家履行國際交換協定，所有全世界國家政府出版品都會寄至中央圖書館。這是中央圖書館的任務，雖然是籌備期間，已執行了圖書館的任務了。

在重慶建館受知 蔣公

抗戰發生，經費從四千塊錢減至一千塊錢，然而我仍照常工作。後來從南京跟著教育部搬到了漢口，再由漢口搬至重慶。重慶市政府給了我苗圃一塊地皮，作建館之用。本來要在南京找房子，中英庚款董事會補助了我一百五十萬元，我抽用了十七萬元在重慶造了一個房子，沒有鋼筋水泥，大多用木頭和石頭，只有一點鋼筋。這個房子在四面轟炸下完成的，其中了一個炸彈，在抗戰期間，屋宇建造工程很不順利，但這屋子從民國廿七年我到重慶開始建造，至廿九年完成，算是十分幸運的事了。

抗戰期間，這間房子成了十分像樣的洋房

，所有重慶的展覽會、一切學術會議都借此展

出舉行，而被稱為「文化之宮」。我在這兒見到先總統蔣公兩次。有兩個原因，使先總統

蔣公對我有印象，「是我造了這房子，全國美展、教育會議，蔣公來都是我陪著說明的。

還有一件事情便是，抗戰發生，二是抗戰初

起時成立了一個國防參議會，（是後來參政會的前身）當時我的百里先叔奉蔣公之命來參加這個會議。在第一次會議之後，他派了兩個

人出國，一是派胡適之先生到美國，另一是派百里先叔到歐洲。總統要他們找人當秘書一塊兒去。我百里叔就選了薛光前和我做秘書到歐洲。我是十月底到義大利，十一月到德國，這時德國、義大利和日本結合為德義日軸心，所以我在廿八年一月，南京陷落，我從德國回國，我先叔要我送報告給蔣公，報告這次在歐洲的情形。於是，我在湖北省會武昌，見了蔣公。

他問我要不要去歐洲，可以給假三個月，與我先叔一道在歐洲工作，我回答還是回到中央圖書館去。蔣公說「很好」。那時中央圖書館已搬到宜昌，我將宜昌的書運到重慶。廿八年開始我在重慶，這時候日機老來空襲，我把國際交換處設在重慶，並以四川省江津縣白沙鎮作為中央圖書館辦公廳。我在重慶設立了一個交換處，我自己大部份時間在重慶住，因為與政府、各機關的聯繫較方便。辦事處是聚興村上清寺，各政府機關、黨部均在此。

傳播・社會・科技

祝基澤著
定價一三五元

本書計收集四十四篇論文，內容包括傳播制度、傳播媒介功能等問題，並討論傳播內容與政治、教育等社會現象及傳播科技三者間互動關係與影響。全書剖析精闢，論斷正確，是一本兼具知識性與趣味性的讀物。

特寫寫作 彭家發著
定價二二五元

特寫通常是署名作品，為報刊雜誌的主要內容，亦為新聞工作者必須具備的寫作能力；一篇及時、優美、而令人傳誦的特寫，當然有極大影響力。本書以探討特寫寫作的技巧為主，透過結構、類別、相關文體、線索的獲得等一連串篇目，融會特寫寫作的理論與實務。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